

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

廖圣清

(复旦大学 新闻学院,上海 200433)

[摘要] 本文较为全面、深入地考察分析了20世纪90年代我国传播学研究的发展情况,总结出20世纪90年代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的五个特点:领域不断扩大、密切关注现实问题、更加规范、与境外传播学界的交流和合作增多、更加深入。作者预测近年中国大陆传播学将出现新的研究高潮,并认为我国传播学研究只处于起步阶段,当前尤其需要注意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做好全国传播学研究的组织协调工作,二是增进对世界传播学研究的新情况的了解和把握,三是大力加强实证研究。

[关键词] 传播学 研究 综述

[中图分类号] G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2570-0289(2003)01-0124-006

自1978年后,传播学在中国大陆得到快速发展。其发展问题,始终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传播学每发展到一定阶段,都有学者对其进行小结,提出新的发展方向。^[1]

但是,检索主要的新闻传播学期刊发现,还未有研究专门深入分析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大陆传播学。由于传播学引入时间不长,关于传播学发展问题的研究,多数是纵贯评述自1978年传播学引入中国大陆以来的情况,鲜有考察近年情况的研究。^[2]

事实上,中国大陆传播学在20世纪90年代发展迅速、变化巨大。众所周知,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大陆传播学受到挫折、研究跌入低谷。但是,在90年代初,中国大陆传播学较快走出了低谷,1993年以降,它进入了崭新的发展时期,不但获得了独立的学科地位,而且逐渐成为一门显学。^[3]对此,不少学者认为,20世纪90年代是中国大陆传播学发展的新阶段。^[4]

所以,无论是为了增进中国大陆传播学的发展研究,抑或继续推进传播学在中国大陆的发展,对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作一番回顾与总结,把握其发展脉络,都是十分必要的。

一、20世纪90年代我国传播学发展的状况

20世纪90年代,就中国大陆传播学的发展问题,学界先后形成了三次较为集中的争论:“对传播学批判的辩驳”、“传播学的本土化”以及“传播学与新闻学的

关系”。三次争论鲜明地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国大陆传播学的发展概貌。据此,可以把这一时期的中国大陆传播学发展历程细分为三个阶段。

1. 1990—1992年:对传播学批判的辩驳,传播学赢得安身立命的根基。

1989年发生“六·四”风波期间,新闻界的作用令人注目。之后,新闻界认真反思,并引申出对传播学的批判。1989年下半年开始,中国大陆传播学跌入低谷。对中国大陆的主要新闻学期刊上发表的传播学论文内容分析的研究显示,1981—1996年间,这些刊物中的传播学论文不断增加,形成两个高峰时期,即1985—1988年和1993—1996年两个时期,而1989—1992年则为低谷时期。^[5]

虽然1989年下半年以来,中国大陆传播学因受批判而受到较大影响,但许多学者此时正理头著书立说(1992年起中国大陆出版了一大批传播学著作),一些学者则以科学的态度来为传播学申辩。例如,1990年第4期《中国广播电视学刊》上发表了题为《西方新闻传播学有哪些可供借鉴》的文章,作者指出:“如果因为西方传播理论中的概念、范畴的中性,抽象作用难以把握,易受其影响,于是就把其中符合科学抽象的东西也一齐抛掉,那样就不可取了”,而是需要“介绍和借鉴西方新闻学中一些符合我国新闻事业需要的观念和新闻观念、新闻反馈观念和受众观念等”。

在争论中,新闻理论界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对传播学有了更加正确的评价和准确的理解,传播学研究

[收稿日期] 2002-03-25

[作者简介] 廖圣清(1971—),男,江西赣州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讲师,在职博士生。

又逐渐热闹起来。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张隆栋教授在总结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的经验教训时指出：“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得到贯彻，两个基本点的相互依存的辩证关系为人正确理解时，传播学研究也得以吸收展开。反之，改革开放政策受到极左思想干扰，两个基本点的辩证关系被人曲解时，传播学研究也为之受挫，趋于消沉，所幸传播学研究的历程，总的说来是顺利的，至于一些波折，为时比较短暂，并且均已成为过去。”^[6]

具体地说，90年代初，促使中国大陆传播学走出低谷的主要原因是：(1)邓小平同志南巡发表重要讲话再次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只要是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都可以拿过来借鉴和应用；(2)中共十四大的召开确定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特征是开放性，建设社会主义新闻学，需要吸收世界优秀的思想文化成果；(3)传播学原理和方法已被广泛运用于新闻学研究和传媒实践。

重新获得自由的研究空间，是中国大陆传播学发展、创新的根本保证。

2. 1993—1995年：传播学本土化，激发传播学界的创新意识

在数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上，就传播学的发展问题，许多学者各抒己见、热烈讨论。论争的主题可概括为：传播学的本土化(对本土化，学界有不同的看法，但对于传播学研究要有自己的东西，还是普遍认同、接受的。本研究借“本土化”来指代它所强调的创新意识)。

1982年的第一次会议，提出“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和自主创造”^[7]的16字研究方针，研究的归宿点是“自主创造”，预示着传播学的本土化方向。

1986年的第二次会议，明确提出了“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的目标，并把新闻传播学作为今后传播学研究的主攻方向，集中人力撰写适合中国国情的新闻传播学。^[8]

1993、1995年连续召开的第三、四次会议，专门就传播学本土化问题进行了研讨。这时，传播学本土化成为一个鲜明的学术问题，并为学界热烈争论。^[9]

争论的热烈，反映出学界对传播学本土化的重视和传播学研究的深入，不满足于只是介绍、评价西方传播学。对于传播学的本土化，一种意见明确要求传播学本土化。与此相对，另一种意见认为，“中国特色”不宜到处套用，研究传播学不要硬贴中国的标签，不宜过分强调“中国特色”。中国特色应在研究传播学过程中自然而然地产生，中国人研究传播学，自然要结合国情，结合实际，自然就有中国特色。对于西方传播学，我们还有一个系统了解、深入研究的问题。过分强调“中国特色”，反而影响对西方传播学的批判吸收。^[10]实际上，这种观点也不是反对传播学本土化，它关注到如何正确对待西方传播学，实际上也就是怎样正确对待并推动中国大陆传播学的发展，它所透露出的是研

究者对中国大陆传播学健康发展的关切。

最终，中国大陆传播学界对本土化的认识更加全面并逐渐达成共识：实现传播学的本土化，注意避免可能出现的问题。

学界还就如何促进传播学本土化，提出了不少建议。比较有代表性的意见、建议从四个方面展开：(1)系统研究国外传播学的主要学派，摒弃其错误的观点和繁杂无用的成分，吸收借鉴其科学的研究成果；(2)认真总结我国悠久的传播事业史的传播经验、传播思想和传播理论，分门别类地进行研究和总结；(3)调查研究我国传播事业的现状和问题，弄清其特点和弊端，大胆进行改革和尝试，以建立新的新闻传播体制；(4)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开展传播学课题的研究，以期早日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理论体系。^[11]

中国大陆传播学界通过对本土化问题的论争，激发了学界的创新意识，并且创新认识逐渐统一，这正是中国大陆传播学发展、创新的动力源泉。

3. 1996年以来：传播学对新闻学的影响和冲击日深，传播学确立了独立学科地位，迎来了发展良机。

自1993年起，中国大陆传播学走出研究低谷，1993年、1995年召开的两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总结了中国大陆传播学的发展历程，提出了“本土化(创新)”这一新阶段的努力方向，共同讨论了一些问题，中国传播学全面走向活跃、渐成气候。

新闻学界将传播学引进、介绍到中国大陆之后，传播学与新闻学产生了碰撞，给理论界和实践界以巨大的冲击，带来了思想解放。自大范围引进传播学以来，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问题，中国学者时有涉及，但一直未能够深入探讨。1996年，从各方面情况(如传播媒介的空前发展、传播学的一定普及、学术界和实践界的期待)看，较为深入、科学地探究这一课题已成必需，时机亦相对成熟。1996年出现了一些这方面的论文，例如中国新闻学院李启教授的《试论传播学与新闻学的定位》(《新闻与传播研究》1996年第一期)。5月8日，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主办的《新闻大学》编辑部邀请本院部分师生与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系教师，就“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问题，举行了一次学术研讨会。会议在对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研究作了一番简单回顾的基础上，分析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区别，着重探讨了传播学会不会取代新闻学，并预测中国新闻学发展的前景，就如何发展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提出建议。虽然没有得出统一的结论性意见，但是，从中大家都感觉到传统新闻学教育与研究的困境，更看到传播学在中国大陆已站稳了脚跟。^[12]正是这一年，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原新闻学由二级学科提升为一级学科，并定名为新闻学与传播学，下设新闻学、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

1997年，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设立传播学博士点。1998年，复旦大学建立了中国大陆第一个新闻传

播学博士后流动站。2000年,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被批准为具有一级授予权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点。同年,复旦大学通过专家评审和实地考察,被教育部确定为传播学的国家级文科研究基地。

传播学对新闻学的影响和冲击的加大,终于确立了自己独立的学科地位,从而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由上可知,90年代,中国大陆传播学走出了研究的低谷,并从新的起点上,快速发展,不但获得了独立的学科地位,还逐渐成为一门显学。在这过程中,内外环境对传播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社会对传播学的态度更加科学,学界对创新传播学的认识更加统一,传播学对新闻传播学科和社会实际的影响更加广泛和深远,媒介的发展和社会的深刻变化对传播学的需要更加强烈……。这些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是,由传播学和新闻学所构建的新闻传播学,“在中国的境遇,已经与主要发达国家‘接轨’,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也是当前中国高等院校系统中所能争取到的最高学科地位”。^[13]

同时,中国大陆传播学的研究队伍有了较大改观。一些在国外获得学位的新闻传播学博士回国工作,更多的中青年学者取得了国内博士学位,具有到国外进修的经历。据对1999年第六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的与会代表的统计,博士和在读博士生的人数比例占27.2%,年龄在45岁以下者占48.6%。^[14]也就是说,高学历化和年轻化已是大势所趋。另外,研究队伍的跨学科性日益明显,越来越多的非新闻传播学科(文学、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背景的研究人员以各种方式加入传播学研究。

这些基础条件的改善是一个渐进、累积的过程。但短短十年,中国大陆传播学能够获得如此巨大的发展空间,同时也表明它已积累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二、20世纪90年代中国大陆传播学发展的主要特点及其成果

90年代,伴随着研究基础的改善,中国大陆传播学呈现以下主要特点,并取得相应的成果。

1. 研究领域不断扩大

众所周知,传播学是由新闻教育和研究人员引入中国大陆,并推动它的发展。因此,关于传播学的介绍、研究的重点,往往与研究人员原来所研究的新闻学的重点相接近,都是围绕着新闻媒介而展开。这种状况多年来未有太大改变,其结果是大陆传播学“研究对象过于单一”,^[15]近乎只在大众传播学的范围内进行研究。

90年代,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领域有了较大扩展。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关于人际传播的研究增多,并逐渐形成热潮。这类研究的涌现,既是大陆(大众)传播学研究走向深入的必然结果,又是传媒实际对传播学理论

研究强烈需求的反映。从理论研究来看,要完整地考察大众传播过程,确切地分析大众传播的效果,必然要涉及对人际传播的研究。从传媒实际需求来看,90年代,中国大陆的广告传播和电视传播,对社会的影响日益广泛和深远,并且它们的传播过程越来越强调人际之间的交流。例如,广告注意通过明星等人物形象增强与受众的交流;电视越来越多的通过设立节目主持人和谈话类节目,来弥补自身作为大众传媒所具有的与受众双向交流不足的缺点。人际传播在这些活动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大,其影响也随之扩散,需要理论对其进行分析探讨。

其次,跨文化传播倍受关注。这类研究是从两个方面展开的。一方面,是关于民族间的跨文化传播研究,在90年代中期形成一定规模。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之间的文化有很多共同之处,也各具特色,做好民族之间的传播有利于我国各民族之间的大团结,这些现实问题需要理论的及时回应。同时,这类研究的展开,也契合当时学界关于倡导传播学本土化的思路;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另一方面,关于国际间的跨文化传播,在90年代中后期日益受到重视,先后有一些系统的论著出版,例如,关世杰的《跨文化传播学》。由于经济的全球化和网络化带来的便利,中国与世界的交流增多,研究者更加关注国际间的跨文化交流。当然,这类研究也受益于中国大陆对外宣传的重视和这方面所积累的成果。因此,中国大陆的关于国际间的跨文化研究往往与国际传播胶合在一起,互动前进。

第三,对批判学派的介绍更广、评析更深。中国大陆学者引进传播学,是从翻译介绍美国研究开始的,并深受其影响。中国大陆传播学一直紧紧依附于美国传统学派,对其他地区的传播学关注不多。90年代,中国大陆传播学对批判学派的介绍增多,并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评析。例如,在1994—1995年间,李彬在《郑州大学学报》、《北京广播学院学报》和《新闻大学》上连续发表了有关批判学派的研究文章,其中有《略论批判学派的产生及发展》、《政治、经济、文化——一种关于批判学派之理论探究的辨析》和《传统学派与批判学派的比较研究》。这是一组比较系统评介和研究批判学派的文章。

一直受到重视的大众传播学研究,90年代也有了新的突破,最具典型意义的是大众文化成为新的研究对象。由于电视传播的广泛渗透,对家庭与整个社会产生深刻影响。一些学者通过实地调查等方法考察传媒效果,总的来说,由于研究方法等因素的制约,中国大陆传播学的实证研究还未展开,更多的研究者从文化学的角度去分析电视的传播效果。电视文化研究开始受到关注,并逐渐延伸到对媒介文化、大众文化的探讨。

2. 研究密切关注现实问题

90年代,中国大陆传播学与现实的互动更加激烈;

变动的现实提供了丰富多样的研究问题,研究密切关注现实问题并及时作出理论解释。90年代,中国大陆的现代化进程显著加快,广度和深度都大为扩展,随之涌现的大量新事物、新问题,急迫呼唤学界予以重视,开展相关研究。中国大陆传播学及时对变化了的环境展开研究。

具体地说,90年代,中国大陆发生的两次社会变动,对大众传播业及其生存环境产生深刻影响。一是90年代初期的“市场化”,二是90年代中后期的“网络化”。这些变化为传播学研究提供了众多研究课题。传播学界围绕这些问题展开研究,开拓了不少研究领域。

围绕“市场化”,对大众传媒的角色和功能的重新探讨,媒介的经济功能更加凸显,媒介的经营管理和产业化成为热门研究课题。媒介“市场化”过程中,不可避免产生诸多问题,关于媒介的伦理道德和法制管理等成为新的研究领域。

围绕“网络化”,中国大陆传播学界开始关注媒介技术对社会的影响,国际传播也随之倍受关注。这两方面的研究,正是中国大陆当下的热门研究课题。其中,闵大洪的《传播科技纵横》勾勒了传播科技的大致轮廓,并探讨了传播科技发展与人类社会互动之间诸多方面的问题,以引起读者的关注和思考。

3. 研究更加规范

90年代中期以来,传播学界日益关注研究的规范问题,这是中国大陆传播学发展的一种必然结果。当对传播学的引进、介绍到达一定阶段,研究方法的掌握和突破,对于传播学的发展,显得尤为重要。中国大陆传播学沿袭的是美国传统学派,该派的主要特色之一,就在于运用一套程式严格的实证研究方法。中国大陆传播学界虽然对传统学派的理论有了较多的介绍,但由于许多学者未能掌握传统学派所依据的实证研究方法,就难以深入地检验和评析这些理论,也难以深入地运用这些理论去解决中国实际问题。

90年代初,中国大陆进行的几次社会调查,获得较多研究成果,也产生了较大社会影响。那时,就有学者开始呼吁重视实证研究,并出现了几篇比较全面地介绍研究方法、强调研究规范的文章,但是应者寥寥。直到1997年以后,这一问题才引起学界的关注。在1997年第五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上,与会者不时游离于设定的主题之外,转向思考学科建设本身所存在的方法和规范等问题。从1997年到199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的卜卫在《国际新闻界》上发表了一组关于传播学研究方法的论文,深受学界好评。学界对研究方法和规范的重视,促成了研究风气的逐渐好转。自《新闻大学》1999年率先在中国大陆实行国际通行的匿名评审制以来,已有数家新闻传播学期刊实行这一制度。

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日趋规范也与研究者素质的

提高相关。如前所述,90年代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队伍数量不断扩大、素质逐步提高。同时,随着学科地位的确立,传播学的研究生教育得到较快发展,也促进了传播学研究的规范和学科的发展。

90年代中国大陆传播学开始重视定量研究,并促进研究的规范化。这时质化研究也开始受到关注,因为学界从国外的经验了解到定量研究也存在许多问题。

4. 与境外传播学界的交流与合作增多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90年代中国大陆传播学界与境外传播学界的交流与合作增多。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带来的诸多变化,吸引了境外许多学者的研究兴趣;中国大陆传播学需要了解境外的传播学发展新情况,并希望早日进入国际传播学界。相互间需求的增多,交流与合作也自然增多。合作研究,不仅加大了资金投入,提升了研究质量,更在于保障了中国大陆传播学界对国际学术前沿的接触,奠定了中国传播学界冲刺世界一流的理论和方法基础。^[16]

首先,大陆、港台两岸三地交流增多,互访、研讨、合作研究等多种形式同时展开。中国大陆传播学者借此了解传播学的最新发展动态;同时,在研究方法和研究规范方面也获益良多。港台许多学者曾留学美国,受过严格的实证研究方法的训练,他们的研究成果为大陆学者展示了规范的研究方法。现在,港台学者在大陆新闻传播学期刊上发表论文增多,对推进大陆传播学研究的规范,起了重要的作用。

两岸三地的交流,还为大陆增进与世界传播学界的联系,发挥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其次,中国大陆传播学界与美国、日本、英国等国家的传播学界,有了更多直接的交流与合作。例如,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在90年代后期,广泛与国外传播学界合作开展研究,1995年与日本NHK合作《各国青少年生活形态比较》研究,1997年与日本东京大学合作《中日大众传媒和受众信息行为比较》研究,2000年与美国知名学者休梅克教授合作《10国大众传媒信息‘把关人’比较》研究。^[17]

5. 研究更加深入

研究基础条件的改善,以及上述诸方面的综合作用,90年代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更加深入。

研究领域的扩大,其实就是研究深入的一种体现。90年代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的深入,更反映在重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扎实、深入展开两个方面。

此前的基础研究,主要是对国外的研究理论作一些介绍和简单的评述。90年代,中国大陆传播学界的创新意识增强,力求摆脱步西方传播研究后尘的状况。中国人民大学沙莲香主编的《传播学—以人为主题的图象世界之谜》(1990年),可说是90年代初期有代表性的一本力作,具有鲜明的跨学科研究特色,着重从社会心理学和生理学去探索传播现象与传播机制;并且

从文化研究的角度考察了中国的传统文化的传播特点。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大陆传播学界开始重视对基本概念的界定、对传播学研究对象的分析探讨以及对基本理论进行再讨论。例如,张国良的《现代大众传播学》、郭庆光的《传播学教程》等论著,在这些方面体现得较为明显,张国良还重视应用中国的实际和研究成果来分析、评价传播理论。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大陆传播学界还注意从学术史的角度考察学科的发展。例如,《评传学史上的第一次大讨论》、《传播观:从“自然主义”到“人文主义”》、《美国传播效果研究的实用主义背景探讨》等。

90年代中国大陆传播学在应用研究方面,更加扎实、深入地开展了许多实证研究,取得了一些质量较高的成果。例如,1990年开展的亚运会宣传效果调查,这次由首都8家新闻单位和新闻舆论研究机构的调研人员,对中国大陆新闻媒介关于第十一届亚运会宣传报道的社会效果进行的调查,不仅大大提高了中国大陆受众调查的质量和水平,为中国大陆受众调查树了一座里程碑,而且使中国大陆新闻传播受众研究取得令人瞩目的学术研究成果。该研究得出的广播电视传播效果模型,是我国传播领域里有关接受理论研究的一大硕果,将受众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陈崇山主持的《传播与人的现代化》研究,旨在研究大众传播媒介的新闻传播对受众现代观念形成的影响,历时三年多,在查阅大量文献资料开展大规模调查并获得大量统计数据的基础上,课题组成员先后在全国性和地方性学术性刊物上发表论文10篇,并于1994年底形成题为《媒介、人、现代化》的专著。卜卫开展的青少年与传播的研究,也取得较好成果。

90年代中国大陆传播学的应用研究扎实、深入的展开,在受众研究方面积累了较多的社会调查资料。同时,90年代蓬勃发展的新闻心理学研究中也积累了较多的受众研究资料。正因如此,90年代,中国大陆传播学成果最为丰富的可以说是受众研究。但可惜的是,至今还未有对这一领域的成果作深入的归纳分析。

90年代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日益深入,还可从1999年召开的第六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得到印证。“提交此次研讨会的论文,大多能较明确地归入专题小组,表明中国大陆传播学者的研究,已从以往较宏观和单一的话题,开始分化、细化和深化”。^[18]

三、20世纪90年代中国大陆传播学存在的问题

回顾90年代中国大陆传播学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中国大陆传播学在这一时期的研究条件不断改善,这为它在21世纪顺利实现创新发展奠定了较为扎实的基础。可以预测,近年中国大陆传播学将出现新的研究高潮。这种预测也是基于对以下两方面情况的分析,一方面,国家设立了全国重点传播学研究基地,将

会加强对传播学研究的组织、规划,加大对传播学研究的投入。另一方面,许多在研项目即将问世,例如,《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大众传播学》、《20世纪传播学经典举要》等,这些研究项目资金投入大,并聚集了众多研究力量。

但同时,也应该看到,中国大陆传播学的创新发展,在1990年代才刚刚起步。这期间所取得的研究创新,都有待深化。下面两个方面的问题,尤其需要引起重视:

1. 做好全国传播学研究的组织协调工作

从研究的整体性和学科的发展来看,90年代,中国大陆传播学的创新,以1993年为界,经历了从不自觉到较为自觉的转变,即越来越显有组织性、成规模。

1993年第三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召开之后,每隔两年召开一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会议的定期、连续召开,使学者能及时交流、反馈信息,讨论问题更加全面、深入。正是如此,1993年第三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上所统一的创新认识,能够持续对中国大陆传播学的发展发挥影响,使得这以后的中国大陆传播学较为明确地展开,更显组织性。

如前所述,在1993年召开的全国第三次传播学研讨会上,与会者就传播学本土化(创新)逐步达成共识,并赞同从四个方面展开。从随后发表的研究成果来看,1990年代传播学的创新,正是沿着这种思路展开的。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大陆传播学已发展到一定阶段,学界越来越关注传播学作为一门学科应如何发展。有研究显示,有关我国传播学文章的主题或内容,“正是围绕学科建设等四个中心在精耕细作”。^[19]

由上可以看到中国大陆传播学者的强烈的学术自觉性;同时,更应该看到学科的规划与组织对传播学发展的重要。仅仅通过研讨、达成共识,来展开传播学研究,没有组织来协调和提供必要的人、财、物的保证,自然会影响到它的顺利实施。现在,国家已在复旦大学设立了全国传播学研究基地,根据规划,这个基地将建成“研究、交流、资料和人才培养”四个中心。^[20]这个中心理应在组织、规划中国大陆传播学的发展方面作出贡献,并推动全国传播学学会的成立。

2. 增进对世界传播学研究的新情况的了解和把握

90年代,中国大陆传播学界与境外传播学界的交流与合作增多使中国大陆传播学界对世界传播学研究的新情况有所了解,但是,这些了解是不够全面、系统、深入的。介绍90年代的新理论,掌握最新材料,“这方面几乎没有人在做。(19)90年代人家都在谈新问题,而我们还在嚼人家七八十年代的東西不也太落后了吗?如果这些工作都没做,在远远低于人家学术水平的情况下,怎么能谈跟上人家的步伐。怎么能搞出比人家高的东西呢?”^[21]

对《中国新闻年鉴》上的新闻传播学书目作内容分析,竟然发现整个90年代中国大陆翻译的传播学著作数量十分有限,不足20本。1990—1992年出版2本,1993—1996年没有1本,1997年之后,翻译著作的出版陡然上升,1997—1999年出版了17本,其中多数属于西方媒体及其创业者的介绍性作品,与传播学研究相关的理论著作微乎其微。直到90年代末,中国大陆传播学界还未翻译出版一本研究方法的著作。

所以,中国大陆传播学,要切实增进对世界传播学研究的新情况的了解和把握。

3. 处理好量化研究与质化研究的关系,大力加强量化研究

90年代,中国大陆传播学界的研究更加规范,更加重视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一些学者已较好地掌握了实证研究方法,一些学者或与数理统计学家合作,成功地开展了一些较高质量的实证研究,取得了相应的理论成果,更为后人的研究积累了宝贵的研究资料。

但是,毕竟受实证研究的方法还未普及、研究资金有限等因素的影响,实证研究在中国大陆还未全面展开。从实证研究方法的应用来看,除了实地调查法已产生一定影响外,内容分析法也未形成规模,实验研究法几近于无。

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重视并呼唤加强实证研究,但还未产生强烈反响。同时还出现了一些反对意见,认为实证研究也有不足之处。这给实证研究的推广带来不利。当前要处理好质化研究和量化研究的关系,大力加强量化研究。

本文仅对90年代中国大陆传播学发展作了简单的描述,从中可以用“创新发展的起步期”来概括90年

代的中国大陆传播学。

[参考文献]

- [1][2][3] 廖圣清.20年来我国传播学研究的回顾[J].新闻大学.98年冬.
- [4] 参阅表年、龙来云、韩运荣.传播学在中国——传播学者讲谈[M].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12第1辑.
- [5][15][19] 黄旦、韩国飏.1981—1996我国传播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对几种新闻学术刊物的简略考察[J].新闻大学.97年春.
- [6] 张隆栋.大众传播学总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
- [7] 徐耀魁、黄林.西方传播学研究座谈会综述[J].国际新闻界.1982年第4期.
- [8] 刘海贵.传播学在中国大陆的历史沿革及走向[J].新闻大学.1991年秋.
- [9][10][11] 刘明安.传播学需要传播——第三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侧记[J].新闻知识.94年第8期.潇湘.在理性的阳光下思考——第五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部分观点述评[J].新闻与传播研究.1995年第1期.
- [12] 谢静、张国良.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本刊编辑部召开学术研讨会进行研讨[J].新闻大学.1996年秋.
- [13] 张国良.新闻传播学学科前沿调研报告[J].
- [14][18] 陆晔.中国传播学:世纪之交的探索与前瞻——第六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综述[J].新闻与传播.2000年春.
- [16][17][20] 张国良.建设中国和世界一流的传播学研究基地[J].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申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论证报告.2000年10月.
- [21] 袁军、龙耘、韩运荣.对传播学研究的几点研究——访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学研究室主任陈力丹[J].传播学在中国——传播学者访谈[M].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12第1版.

The Study of Communication in Mainland China in the 1990's

Liao Sheng-qing

(School of Journalism,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Abstract: With an overall probe and an in-depth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of communication in the 1990s, this paper sums up five characteristics of communication study in mainland China in the 1990s: an expanding scope of research, an unprecedented concern for practical problems, a tendency towards more standardization, a growing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with overseas academics, and a more deep-going study. In addition, this paper predicts a new boom in the study in the next few years. The communication study in China, this paper points out, is still in its preliminary stage. At present, great attention must be paid to three issues: better organizing and coordinating work of China's communication study,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new situation in the world communication and greater emphasis on positive studies.

Key Words: communication, study, summary

[责任编辑 张兵]